

●纪实文集

二十一年

作家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二十一年/纪实文集——作家出版社,2004.12.

ISBN 7-5063-0902-5/1.893

I·二…2.文集……3·纪实……IV.C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12460 号

**二十一年**

·纪实文集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地址: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100026

**责任编辑** 林葵

**印刷** 云南民大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624 千

**印张** 25

**版次** 2005 年 6 月第一版

**印数** 1—1000

定价:50.00 元(上·下册)



## 沉痛的悲剧

——忆“整风反右”运动

沈迎春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共产党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1979年初，我的错划“右派”冤案得到改正，重获为党工作的机会。离开东风农场，我像飞出囚笼的小鸟，自由飞翔在蔚蓝的天空，沐浴着暖人的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深感自由之可贵，工作之幸福，我埋头工作，为党为人民办实事，以尽量挽回二十一年失去工作的损失，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我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然而时间不等人，在农场是度日如年，恢复工作后是度年如日。1990年末，年届六十，办理了离休手续。离休后，很想把二十一年的风雨人生作简要记述，留给子弟后代。但是，往事不堪回首，几次动笔心酸难禁，无法下笔。近年老友们多次鼓励，加之应聘到泸西县党史研究室帮助工作，有良好的写作条件，才鼓起勇气下决心写。亦想为党史部门提供些资料，有所补益，否则好了伤疤忘了痛，愧对老友，愧对子孙后代。



## 同情“右派”即为“右派”

1956年，国内形势很好，政通人和，一派欣欣向荣景象，共产党、毛主席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9月15日，中共中央召开“八大”，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再是阶级斗争，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日愈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但不幸的是，不久，“八大”的正确路线被抛弃，代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倾错误路线。1957年6月，“整风反右”运动，像暴风骤雨来势迅猛。

8月，泸西县开展“整风反右”运动，当时，我任云南省立泸西师范学校党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校长任副书记。在第一批中小学教师开展“整风反右”运动时，我是县“整风反右”运动领导小组成员之一，主管运动的县委副书记任组长。在排队划右的会议上，首先对我校教职员进行划右排队。当我校负责人事的×××提出要划黄济昶，万鹤峰两位教师为右派时，我从实际出发提出相反的意见。黄是语文教师，很受学生欢迎。万是音乐教师，是学校开展文娱活动的指导者，他俩都是师范学校不可缺少的人才。我说：“他俩是骨干教师，是思想问题，不是本质问题，万鹤峰爱人正与他闹离婚，若划为右派，爱人更有理由提出离婚。”运动中领导小组长（以下统称县委负责人）要我动员校长鸣放，我没有照办，认为鸣放不鸣放是人家的自由，为什么要动员呢？我对运动很不理解，不会观风向，没有紧跟。后来我才知道县委准备划这位校长为右派，我没有按县委意图办。有人讥笑我是傻瓜，当了替罪羊。县委负责人在领导小组会议上说：“右派是思想上的反革命分子，对他们要一棍子打死。”我仍然不理解，分什么是思想上的反革命分子？整风反右运动，为这位县委负责人提供了大显身手和打击报复的机会，我知道他是以“左”为命根子的人。



运动基本结束后，在党内对我进行了两天的批判。我出身于地主家庭，整风办公室的一帮人，秉承县委负责人的旨意，集中火力，上纲上线对我猛力袭击，什么“思想右倾”、“为右派说话”、“地主阶级的反动本质”……。虽系党内批判，但已把我当作“右派”来批判了。最后，县委负责人要我写检查交县委，我思想包袱沉重，一直未写，因为我已跌进了运动的漩涡而将被淹没，写了违心的检查，反而自我提供罪证。

1958年8月，云南省委书记谢富治，在云南搞“反右补课”，来势更猛。他编造出“郑王反党集团”，殃及了很多人，原泸西县委书记、时任曲靖地委常委、曲靖县委书记吕华民在曲靖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骨干分子。曲靖地委指出，泸西大跃进上不去的原因是反右不彻底，按照顺藤摸瓜的阶级斗争战术，要抓出吕华民在泸西的代理人。于是，县委秘书科长（办公室主任）张吉明、原组织部长徐嘉骧、县妇联主任何建华、团县委副书记金字芬、法院院长皇立本和我六人，同年9月，在县的三级干部会上，遭到残酷的斗争和无情的打击，人格受尽污辱。仍是那位县委负责人在大会上作动员时公开说：“张吉明这个反革命分子，大家要好好地揭、好好地批，三反运动时他伙同××（当时任县委书记）围攻我。是的，三反运动期间张吉明、唐筱全和我三人。曾对他（时任公安局副局长）的官僚主义作风作过批评。我还在另外的会议上批评他在公安局搞宗派。他要借“整风反右”运动对我们进行打击报复，置我们于死地，这是我早已预料到的。

文教科长×××召开泸师教职员会议，动员布置揭批我。在泸师、泸中两校一千多人的大会上，批斗了我两个晚上，从八点至十一点，令我立正站着接受批判，不给水喝，不许坐下，使我两肢麻木，头晕眼花。师范学校的人事秘书逼着我交代与吕华民的关系，我只能如实地回答说：“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我兼



中师十二班的班主任，班长魏吉华，成绩优秀，家庭很困难，交不起书钱，我曾资助过他两次，每次五元（相当于现在的二百元），他被动员站出来揭发我，说我拉拢腐蚀他。这个学生直到现在不敢来见我，他深感内疚，但我理解他，他出身地主家庭，被迫说了违心的话。

为把我批臭，县委负责人、文教科长等人确实大动了一番脑筋，他们找不出我在工作方面的“罪证”后，急中无奈，便吹灰找裂缝，把我老家党组织负责人，村干部通知到学校来拼凑我的“罪行”材料。他们把我给过祖母、妹妹钱物的正当行为，说成是我与地主阶级家庭划不清界线，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他们整人不择手段，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我被关在一间小屋里，派两个学生看守着，防我自杀，其实，我哪想自杀，我不那么蠢，我有爱人、孩子，我没有做过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自杀，反而留下“畏罪自杀”的罪名，给家人留下终身的耻辱。想着被强加的莫须有的罪名我彻夜难眠，犹如一场恶梦。泸西中学物理教师陈国俊，讲课通俗易懂，是一位深受学生爱戴的好教师，运动中因忍受不了校长×××、教师×××等“左派”强加的罪名和人格污辱，结果抱着“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态度，吞砒霜自杀了。死后，公安局长×××咬牙切齿地说：“敌人畏罪自杀，是自绝于人民的狗屎堆。”因此，对我严防是有原因的。逼死陈国俊老师的那位“左派”教师，初中时与我同班同学，其父被判刑劳改，他灵魂肮脏，善于伪装观风向，历次政治运动都是积极分子冲锋在前，到师范学校来批判我也是积极分子，胡言乱语、无中生有地对我揭发批判一通。

谢富治的“反右补课”主要是打击原云南地下党、边纵的知识分子干部。我们六人正是打击的对象。我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入党的地下党员，皇立本是三十年代入党的老党员。全省有许多县以上的干部被打成“郑、王反党集团”骨干分子而戴上“右



派”帽子。与我们同时受批判的还有县委书记×××和县委一位部长，由于县委书记是来自老区的南下干部而被保护下来，另一位则向县委负责人痛哭流涕地检讨认错而得到宽恕，未戴“右派”帽子，作撤职降级处理。

我们从受批判的当月起，原工资被取消，改发16元的生活费，真是政治上批臭，经济上搞垮！在数千人大会上宣布我们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党籍。我们六人被称为泸西的“大右派”。开除我们的党籍并未经过支部讨论通过。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被开除出党是一生中最痛苦之事。几天之内，由光荣的共产党员沦为“阶下囚”，我们痛心疾首，百思不解。

1979年3月，我们错划右派冤案得到改正，恢复党籍、恢复工作、恢复原工资级别。改正结论最后称：“沈迎春同志在党的会议上提出不同意见，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纯属错划。”我恢复工作后，任泸西县文教局副局长，局里人事股的同志对我说：“沈同志，你太冤枉了，你的档案里只有一张同情右派、包庇右派的字条，没有地委批示材料。”我就是因为坚持实事求是而被打成“右派”的。

### 在非人的生活中煎熬

我们泸西罹难的67人。划为“极右”分子的送曲靖牙比克煤矿劳动教养。大多数受监督生产处理的送弥勒东风农场劳动改造。个别年纪大的就地改造。我们多数难友正是青春年华，我刚满二十八岁。有的夫妻双双罹难，夫妻被分配到不同场所改造，而各在一方，女的只得带着孩子到农场。何建华带着两个孩子，要求与我们一道到农场，县委不同意，把她送回宜良农村老家由群众监督劳动。

1959年初，春节前夕，在武装人员前后左右押解下我们四十余人到饭店吃饭。沿街群众以惊奇、同情或迷惑不解的目光在



注视着。饭后即步行来到弥勒东风农场。这里原是劳改队所在地，是改造罪犯的地方。1958年为省级机关下放干部和一批右派改建为东风农场。意在东风压倒西风，左派压倒“右派”之意，不少人认为在这里接受改造的“右派”是劳改犯人。

我们受的是监督生产行政处分，可到了农场后，就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象。农场的党政领导有些是从公检法专政机关调来的，他们完全是按管理罪犯的一套办法来对我们行使专政，在“右派”中成立互监小组，有谁劳动中不积极或有不满意言论要及时向队长汇报。他们把“右派”当作会说话的牛马，每天从天明到天黑，除了吃饭的时间外，其余时间都在劳动。有位女难友边解小便边拔花生。中午送饭到工地，饭后连碗都来不及洗，队长的哨子一响，就得动身投入紧张的劳动。农忙季节，本已疲惫不堪，还要摸黑加班到深夜。走在路上因为打盹而互转碰撞。

劳动时间长，超负荷的劳动强度，又吃不饱肚子，大家都在饥饿中煎熬着。劳动中不敢谈论国家大事，更不敢发泄不满，常是谈论红烧肉、炒猪肝如何好吃，作为精神会餐。在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粮为纲的方针指引下，农场的各级管教人员把粮食看得比人的生命更重要。同样的粮食定量，我们不能吃同样的饭，农场为了激发“右派”的劳动积极性，规定分等级吃饭，劳力强的吃一等饭，一般的吃二等饭，老弱及妇女吃三等饭。我吃的是一等饭。为争取多吃一两饭，大家拼命地劳动，结果身体垮了的往往是年轻劳动力强吃一等饭的。分饭时，十多双眼睛都盯着分饭人的秤，分完后争着洗饭桶，图的是那沾在桶边上的一口饭。

有两位难友，忍受不了饥饿的痛苦，夜间到晒场上“偷了”一小袋花生，还未吃到一粒就被抓获。第二天被吊在过梁上打死一个，另一个叫解传宝的活了下来。有人抓住老鼠剥去皮丢掉内脏，煮食充饥。猪场母猪流产丢在粪堆上的胎儿，被一个人发现后，视为营养价值高的宝贝，抬了来煮熟像吃红薯一样的吃。





由于饥饿和劳累，多数人折磨得面目全非，皮泡脸肿，医生不敢说是营养不良造成的，说是害水肿病、干瘦病。其实就是缺乏营养，身体人不敷出造成的。有一些难友因饥饿，无奈把衣服手表卖了买吃的，也只能是解一时之饥，三年饥饿岁月实际是在死亡线上挣扎啊！

夏天，农场气候炎热，早上出工，多数人赤着黑亮的身躯，穿着破烂的短裤，赤着脚，瘦骨如柴，背着碗筷，摇摇晃晃叮当作响的走着，恰似一群讨饭的乞丐。川大毕业生雷思明，原是下放干部，到农场不久宣布戴上“右派”帽子。他饥不择食，拾别人丢了的鸡蛋壳吃，到水里摸螺蛳生吃，结果肠梗阻，农场医院条件差，同是难友的胡同增医师以精湛的医术，为他开刀拿出一盆蛔虫，救了他一命。他认为吃鸡蛋壳，既可充饥又可增加钙质。难得的星期天，他抱着衣服鞋子，跑步到弥勒县城赶街，到了城附近，在水沟边洗了脚，穿上衣服鞋子，返回时又脱掉，路上行人以为他是精神病人。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说是为了节约，穿烂了要花钱买，脚破了还会长好。真的，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大家都学会补衣服，有一些难友还学会制作煤油炉子、手工卷烟。劳动时，穿的都是补了又补、汗水浸透的烂衣服，都是同样的命运谁也不笑谁。周围老乡形容我们：“劳动像花子，休息像干部。”

我的亲人听到我患水肿病的消息后，心急如焚，妻子张曼月把供应她们母女的猪肉炼成油托人送来给我。堂弟、表弟从农村一年几次送来炒面、鸡蛋等食物。都为救我一命而千方百计想办法。妻子每月四十元的工资，带着两个孩子，还要请保姆，真够她辛苦了，她同样在困难中挣扎。当时，难友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要坚强地活下来，“留得青山在，何愁无柴烧！”相信黑夜过去，曙光就在前面。

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死在劳改队里和被枪毙了的两位难友



张吉明、陈学诗，（另文详述）让人们了解他们是如何枉死的。张吉明是一位为人正直党性强的好同志，1958年的大跃进中，县委分工由他负责兴修板桥河水库（中型），他身先士卒，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每次到县上开会、汇报工作，总是头戴草帽，脚穿草鞋，泥脚泥手。由于民工吃不饱肚子，工程进展缓慢，他多次向县委、政府反映，要求供应农民粮食，他出于实事求是关心群众疾苦，孰能料到竟强加给他反对国家粮食政策的罪名。他被打成“右派”，多数干部想不通，有人气愤地说：“张吉明辛辛苦苦修水库、冤冤枉枉当右派。”他一直不承认自己是“右派”，到农场不久，擅自离场准备上访申诉，被泸西县公安局发现后，拘留在看守所半年之久。县委负责人、公安局长利用罪犯把他打得遍体鳞伤。送回农场不几天，泸西县法院派人到农场宣布判刑五年。最后因患痢疾得不到治疗而死于劳改队。

在农场的土地上，浸润着“右派”的鲜血和汗水。春耕，我在耕牛班耙田，不慎被耙齿穿通了脚杆。这样，当“右派”不仅留下心灵的创伤，又留下肉体上的伤疤。队长派我和几位难友上山挖臭石子作肥料，下午三时许，我们放下工具休息片刻，不到一分钟，牛大的石头咚的一声落地，正好落在我们站着劳作的地方，大家吓得毛骨悚然。也许我们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而得到的是饥饿和凌辱的痛苦。一些被认为是消极怠工的难友，常遭批斗打骂。一些葬身农场的难友，多为非正常死亡。有病得不到治疗，还被强迫劳动。朱文灿原是省政法干校讲授《宪法》的教师，已经病在身上，冬天，寒风刺骨，生产队还派他赶着牛车上山拉木料，又冻又饿，结果死在路上就地掩埋。蒙自中学的音乐教师李绿萍，是一位艺术人才，与我同在一个班劳动，休息时人们常听到他悦耳的小提琴声。他年纪较大，五十岁左右，心脏病复发，已经不思饮食，被队长强迫出工，到了工地已经站立不住，奄奄一息。班长认为他



要死皮，踢了他一脚。第二天一早大家集合出工时，发现他不在，班长进屋掀开被子一看，人死了。一只眼球已被老鼠吃掉了。队长派人用草席裹起抬出去掩埋。农场各级管理人员，人死了还不让亲属知道。在农场含冤死去的难友不少，我无法一一赘述他们的悲惨遭遇。仅泸西被打成“右派”的六十七人，就有十三人葬身农场和煤矿。写到这里，我的心情极不平静，悲愤的泪水潸然而下。

难友郎若玉，是一位坚强而富有能力的女性。她在个旧市任区委书记时年仅十八岁。当宣布她为“右派”时，这晴天的霹雳，使她昏倒在地。送到农场后，蓬头垢面，神志不清。同队难友吉浪涛（曾是志愿军连长、战斗英雄）和她结婚，生有二女。冬天她抱着自己的孩子到田边，突然把孩子丢进冰冷的水田里，幸被难友及时抱起，挽救了孩子。直到1979年初改正回原单位后，环境变了，神志才慢慢地清醒过来，左倾错误路线毁掉了一位党的优秀女儿。吉浪涛是一位值得人们敬佩的人。

农场的各级管教人员，从党委书记、场长到生产队长、指导员，每逢春耕、秋收开始，都要开大会斗争“右派”，杀鸡让猴子看，用斗争会来掀起生产高潮，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法，也是他们的法宝。有一位场长不准“右派”接近他，和他讲话要离他三米，农场的一些干部在职工和知识青年中大肆宣扬“右派”是阶级敌人，要他们与“右派”划清界线。结果与他们的愿望恰恰相反。农民兄弟、知识青年认为我们根本不像他们所说的那么坏。劳动中我们是主力，踏踏实实、任劳任怨，对人诚恳，语言文明。好学的知青亲近我们，向我们请教，农民兄弟同情我们，认为我们是遭冤枉的，是共产党的好干部。我们为农民职工写信，辅导他们的孩子学习，在磨难中同他们结下了深刻的友谊。

生产队的某些干部在叫喊与“右派”划清界线的同时，背地里却在利用“右派”的才智，叫“右派”替他们写年终总结，清



理会计账目和建账。有一位指导员之妻，就要我代他写状纸呈递法院。

农场对“右派”的改造，还有一手，就是利用“右派”之间互相揭发批判。“右派”中也确有个别人，心术不正，为一己私利，经常向队长、指导员打小报告，为他们开会斗争“右派”提供材料。

赵福运是东北林业大学毕业生，林业部门的技术干部。有人检举他用茅草刺毛主席像后，一直是队长等人的眼中钉肉中刺，经常遭到大会小会的批斗。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向上反映队长的问题，被关在生产队私设的监牢里，连大小便都不准出来解，时间长达几个月，牢房里臭气熏人。职工强烈要求停止这种不人道的做法。到他被放出来时，头发长得不男不女。队长叫一个知青为他理发，这知青竟然提起热水瓶直接浇到他头上烫得他狂跳起来。剃后的光头到处是水泡。看守他的知青，不慎把钥匙掉进厕所里，时值寒冬，硬逼着他脱下衣服，忍受冷冻熏臭到粪坑里捞起了钥匙。每天劳动要他完成两个人的任务，那个看守知青在田边睡大觉。更为恶劣的是收工时，还要他用自己的鞋子打自己的嘴巴十下。赵福运老友是一位铁骨铮铮的硬汉子，他坚持真理，宁死不屈，那位队长欲置他于死地而未能达到目的。他坚强地活下来了。

### 罪及妻孥，祸延九族

“整风反右”运动，是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中国遭到的一场大劫难。全国五十五万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不仅我们个人蒙受冤屈，我们的亲属也受到株连，遭到歧视。徐嘉驥划为“右派”后，他的孩子被组织部的干部称之为“小右派”，左派先生们的革命性真强，不仅革了大人的命，连小孩的也要革啊！许多美满幸福的家庭，在倾刻之间被“整风反右”运动的洪流冲散



了，他（她）们的妻子、丈夫因受株连遭歧视，顶不住政治上的压力而违心地离了婚。也有的是自己不想离，而是受人挑唆鼓动离了婚。也有的“左派”趁机夺了“右派”的妻子。有一些难友对方丢下孩子与他（她）分手后，背着更加沉重的思想包袱带着孩子来到了农场，让孩子也同时接受改造。省计委的陈捷就是带着刚会走路的儿子陈镇到农场来接受改造的。靠他十六元的生活费维持父子二人的生活是很难的啊！为了生活，他把值钱的衣物都卖了。他身处逆境和劳累，但从不放松对孩子的教育，利用空余时间教孩子识字写字。孩子不仅失去母爱，同时也受到其他孩子的欺负，打他、骂他“小右派”，他在同学中间是低人一等，幼小的心灵受到创伤。看到难友的孩子无辜如此受辱，我的心在阵阵剧痛，自然联想到我的孩子又会怎样？！

闵竹在省里某单位划为“右派”后，怀孕到农场改造，孩子生后，因母亲身处逆境，得不到很好哺育夭折了。班长派皇立本和我用箩筐抬出去掩埋，班长看着掩埋，痛心已极的闵竹不敢放声大哭，害怕被认为发泄对党的不满情绪，只好默默流泪。可怜的孩子真是生不逢时啊！我更加思念我的女儿，因为她妈妈到大理卫校读书去了，孩子刚满周岁，只好送到宜良交给双目失明的外婆带着，老人家同时带两个刚学走路的孩子，用两根布带像栓小狗一样的栓着孩子，一只手拉着一个，怕孩子跑出门出事。

中央文件明确规定对“右派”的亲属不得歧视，子女升学、就业、参军不受影响。实际上，下面根本就不执行。中央也未作督促检查。不仅“右派”的亲属受到株连，非直系亲属也同样受株连。省委党校教员卢金凯夫妇双双罹难，女儿学习成绩优秀，初中毕业后，农场不准报考高中，但孩子卢纫也很争气，在父母的辅导下，发奋自学完高中课程，考上云南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一位难友的女儿有天赋的好嗓子，报考艺术专业，笔试、口试都合格，政审被淘汰。孩子痛苦已极，横下心来要求母亲与



“右派”爸爸离婚，天真的孩子哪知道，即使父母真离了婚，她仍然是“右派”的女儿，仍然受株连。

我被打成“右派”后，亲戚不敢与我通讯，老朋友、老同学看见我绕道离开，大家都怕被株连，违心地要与我划清界线。我似乎成了麻疯病人，使人不敢接近。在泸西的干部中仅有王开仕同志对我们的遭遇深表同情，我到农场后，他主动写信给我，信中说：“你们遇难，我做梦也未想到，你们是党的好干部……。”他对我比较了解，我俩同在县委宣传部工作过，我是他的领导。他凭着共产党员的良心这样做，在当时是要担很大风险的，为不影响他，我没有回信，想他能谅解。

一人犯罪株连九族，这本是中国历史上封建王朝残酷镇压平民百姓的王法。新中国成立后消灭了封建剥削制度，但封建意识并没有随之消灭，仍在人们的头脑中顽固地存在着。

### 患难夫妻，相依相伴

我被打成“右派”后，我的妻子张曼月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她带着两个孩子，经常被县医院领导派到农村工作。两个孩子只得交给保姆照管。几次晋升工资没有她的份，有的人连晋两级，医院调资指标剩下，宁愿上交，也不让她晋工资。口头上称她老医生：哪里艰苦就派她到哪里去，实际上是对她的歧视和惩罚。她顶住压力，眼泪往肚子里吞咽，她十分了解我，深信我是好人。为了孩子，保持一个完整的家，我们夫妻风雨同舟，心心相印，我每月十六元的生活费，除伙食费五元及少得不能再少的零用钱外，每两月寄十元回家添补她们母子三人的生活，凭票供应的物品，除布票外，其它的食品均让给难友去买，抽的烟是报纸裹的喇叭烟。妻子来信说：“要不是为了孩子，我实在不忍心花你从牙缝里省下来的血汗钱啊！”为了孩子我甘愿牺牲个人，我没有忘记1962年生第二个孩子时，国家处于大饥荒时期各种



物资奇缺。我们这个小家更是难上加难。作为母亲生孩子应该是高兴的，可是我的妻子却抱着孩子泪珠滚滚流下，因为她将承受着生活上、政治上、工作上更大的压力。我们夫妻互相安慰鼓励，无论如何要把两个孩子养大。

妻子和孩子是我的精神支柱，当我苦闷时常是反复看妻子的来信和她们母女三人的照片，藉以消除疲劳和苦闷，增强生活中的勇气。

“整风反右”运动，造下了成千上万个家庭的悲剧，妻子不仅未曾提出过与我离婚，反而于1966年申请调来东风农场职工医院工作，为的是家人团聚，互相照顾，共度难关。她让孩子多吃红薯，省下大米饭给我吃。同时，女儿也很懂事，学校吃肉，她舍不得吃，托同学带来给我吃。星期天，我们全家四人挑上竹笋上山拾柴，他们母子三人在地面上拾松球，我爬上树砍柴，在劳动和磨难中享受天伦之乐。

1979年初，我恢复工作，全家在农场生活了十三年后，怀着喜悦的心情回到泸西。妻子仍回县医院妇产科工作，她说：“做梦也想不到还会有这一天”。我们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家，归功于品德高尚的妻子。至今，难友们及泸西的广大干部对她的品德都深表敬佩，有的伸着大拇指称她贤妻良母。我感谢我的妻子，更深深地爱她。现在，我们夫妇已离退赋闲在家，儿女成家立业，晚年幸福，夫妻情笃。

回首当年，在我被送农场改造前，她背着人到了我的住地，为我送行，她安慰我说：“你还年轻，好好在农场改造。不要考虑我会与你离婚，不会的，你放心去吧，我等着你。”她忠于爱情，用自己的行动，实现了当初对我的诺言。

### “摘帽右派”与“撤处人员”

文革中，我们虽然经过上报批准摘掉“右派”帽子，但在政



治上与其他职工仍有区别，不能享受同样的待遇。在职工队伍中，有基本职工和一般职工之分。农场仍然把我们打入另册，仍然对我们施以专政，他们称我们为“撤处人员”、“摘帽右派”。意即摘了“右派”的帽子仍然还是“右派”，造反派成天的在高喊“只准左派造反，不准右派翻天。”我们又成了“黑五类”、“九种人”。我回家也遭到医院造反派的干涉，不少的难友遭到批斗，非刑吊打，穿麻布衣裳，人格受尽侮辱。

某生产队指导员更有新的创造发明，开会称贫下中农为革命职工，称摘掉“右派”帽子的为“劳动职工”。农场倒虹吸水利工程竣工，“革命职工”参加开庆祝会，而参加设计施工流血流汗的“劳动职工”却不准参加庆祝会，命令继续劳动。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集体磨了一个下午的“洋工”。

有两名军队外调人员找我了解一干部情况。介绍信称：“通过摘帽右派沈迎春了解×××的情况。”我看后十分生气，但敢怒而不敢言，只好佯装什么都不知道来回敬他们，让他空手而归。通过此事，我方知对“右派”抓住不放，不仅农场如此，全国也一样。

我的妻子患急性青光眼病，我陪护着她到开远五九医院手术治疗，农场保卫科工作人员在开给我的介绍信上，把“同志”二字删去。幸好旅社对我高抬贵手，准予登记住宿，未作盘问。也许是出于对东风农场“右派”的同情。医院食堂炊事员看我又黑又瘦的可怜，打给我的饭菜比一般人的都要多。

## 历史的反思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指出：开展整风运动就是为了适应我国由革命时期转入建设时期的新形势，开展整风学习就是为了克服近几年来党内滋长的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运动开始时从中央到地





方，各级党委都是书记亲自动员，反复动员广大干部群众帮助党整风，并要求党、团员带头提意见，善良的人们出于忠于党、热爱党，对领导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作风，提出了善意的批评和建议，结果，闯下了大灾祸，上当受骗成了右派分子，其结果是：整风是借口，划右派打击知识分子是目的。1958年大跃进中，泸西县虚报浮夸成风，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的破坏，以致大量饿死人的严重恶果。公安工作却扛了红旗。这红旗来自于虚报浮夸，乱抓乱捕，结果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从泸西县的事实情况看，整风反右后，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丝毫未被触动，那位县委负责人原就是三种坏作风都具有的人物，他是来自山东南下的农村干部。粗识文字，缺德无才，在他的心目中凡是给他提意见反对他坏作风的人都是敌人，他的专长就是在阶级斗争的大旗下肆意整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寻机报复，打击给他提过意见的人。

整风反右前公安局秘书张建绿同志因批评他的政客作风，结果被开除回家，成了精神病人。1984年落实政策后，至今还在建水精神病院，已年过古稀，孑然一身。对阿谀奉成、吹牛拍马之徒，则备受重用，在一段时期内泸西党政大权就落入他们这伙人之手。

我含泪忆述历史的悲剧，为的是让后人、年轻的一代了解那段历史，让悲剧不再重演。让后人对“整风反右”运动作出公正的评论。我深信沉睡的历史，是会醒过来的。

### 被枪毙的“右派”——陈学诗

陈学诗，泸西县人，家居县城东门外，初中文化。一九四九年初，他得知组建华定周游击大队，便萌生了参加游击队干革命的念头。他背着父母找到华定周大队长，十分珍惜地抚摸着华大队长的十响枪，要求参加游击队为华大队长背手枪，在他苦苦要